



從傳播到經濟的曲折路

楊淑琚*



能夠榮獲科技部傑出獎，是我十多年前從傳播轉唸經濟始料未及。我非常感謝審查委員的肯定。我的學習歷程及工作經驗與大多臺灣社會科學的學者較為不同，藉此機會分享，希望對於年輕學者或正在徬徨、尋找未來方向的同学有所啟發。

我大學讀政大廣告系時，隱約感到自己的個性不適合大眾傳播的行業。大學時，我立志出國留學，於是埋首苦讀英文。大二時有幸修習彭欽清教授的英文課，改正了我過去應付考試的學習方式，從此完全放棄英漢字典，而改用英英字典，以及盡可能的學習新聞和商用英文，閱讀主流外國媒體文章和加強英語聽力。雖然學習英文是我大學生活的重心，但在懵懂的四年裡，仍然沒有找出自己的興趣，所以出國攻讀的第一個學位，仍為傳播領域。

進入美國南加大傳播學院就讀後，修習一系列傳播政策與法規的課程。

* 國立中山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電信傳播產業性質特殊，一方面新聞自由受到憲法保障，許多法規都是在最高法院嚴謹辯論下形成，當時我經常對大法官思慮縝密所寫出的正反意見，感到深深折服，興起了讀法的念頭。另一方面，許多法規背後有其經濟原理，也開啟了我對經濟學的興趣。碩士畢業後，我進到洛杉磯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一年後，我決定往傳播政策的領域進修。

那時我已具備傳播產業知識，我單純地想，只需再學量化工具，應可達成目標。為了學習政策分析，起初申請進入南加大的公共政策學院就讀，開始接觸到經濟和統計。對行政管理的課程，我卻感到苦惱，發現並非興趣所在。在與指導教授詳談後，鼓起勇氣寫信給專注於傳播產業分析的經濟學者，表達我學習熱誠並為自己爭取獎助學金。當時印第安納大學電信傳播學系的 David Waterman 教授（現為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的首席經濟學家），幫我爭取到三年的全額獎學金。他鼓勵我到經濟系修課，以彌補我經濟訓練的不足。

由於我高中畢業後，幾乎沒上過數學，對於我這樣連矩陣都沒有見過的人，在經濟系修習研究所計量與產業組織課程，實在非常困難也造成相當大的挫折。經過再三思考，如果沒有扎實的數理訓練，如何能做好傳播產業分析？於是除了研究所的課以外，我打算從基礎學起，便開始自學一些經濟學的大學教材，同時到數學系去上大學部的課。幾個學期下來，經濟系的授課老師雖然知道我程度不佳，但是看到了我努力的態度，給予了我許多鼓勵。不知不覺的，我只差一門總體經濟學，即可拿到經濟學碩士學位。

在修習總體經濟學課程時，Eric Leeper 教授了解到我的數學程度，以及我所要做的產業分析屬於個體和應用計量的範疇，因此一度力勸我退選。Leeper 教授曾在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系統服務八年，他的課程額外提到許多總體政策的討論，雖然我很多數學推導看不太懂，但政策部分卻讓我聽得津津有味。他察覺出我的興趣，利用課外時間耐心告訴我要自己惡補哪一塊數學，才能聽懂他上的哪一段。漸漸地，我想完全轉到經濟系的想法越來越強烈，但我首先要解決獎學金的問題。經濟研究所一般偏好收經濟、商學或數理背景的學生，以我的傳播背景實在難以與之競爭。當下我決定考一年級博士生的資格考，如果考過了，我想系上也不好拒絕我的博士班入學申請。一年後的暑假，我通過資格考，也順利拿到入學資格和獎學金。我懷者忐忑的心情，告訴 Waterman 教授我想轉作總體經濟研究的心願，他非常仁慈的恭



喜我：既然找到了自己的興趣，當然要義無反顧地追求。

往後幾年，我平均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卯足全力地完成經濟博士學位。在尋找論文研究主題時，記起 Leeper 教授曾提到財政政策制定的時程比貨幣政策繁瑣拖延許多，直覺上用 Vector Autoregressions 的方法來估計財政政策的效果不妥。為了能夠有系統地記錄立法過程和政策改變訊息的揭露時點，我有好幾個月埋首圖書館，翻閱國會會議紀錄和總統宣示政策改變的報導，而整理出自二次戰後美國聯邦政府重要財稅政策改變的緣由和時程，此一過程也讓我深入了解美國聯邦稅法用以對抗景氣循環和健全財政演變的過程。原本覺得轉行做總體經濟，之前唸傳播法所下的工夫都浪費了，但這些訓練讓我不畏懼接觸美國稅法和第一手的政策文件，也讓我畢業一年後從俄亥俄州 John Carroll University 的助理教授，能夠轉到美國國會聯合財稅委員會 (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 擔任 Economist 乙職。

在政策機構工作，雖然時時接觸到與我研究相關的議題，但大部分的精力都在做具高度時效性要求、快速的分析。當時財稅委員會上上下下只有我一個外國人，深怕同事覺得我英文溝通或分析能力不足，格外努力謹慎，壓力頗大。另外，為了維持研究動力，我經常白天做政策，晚上做學術研究。後來認識了當時中研院經濟所所長管中閔院士，他非常誠懇地鼓勵我回來服務。在中研院近兩年的期間，我得以把博士論文發現的初步結果和印第安納大學兩位教授做更深入的探討，後來完成我自從事總體經濟以來最重要的研究成果，而後在經濟學最重要期刊之一 *Econometrica* 發表。當時我論文裡所稱的政策訊息預知——“foresight”，也成為近幾年來總體經濟學研究的熱門題目之一——“news”，強調對未來政策或經濟訊息提早得知，對總體經濟的影響。

之後我因家庭因素再次返回美國，在國會預算辦公室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服務。當時正逢金融海嘯過後，我參與美國最大規模刺激景氣復甦財政政策制定的過程，也因此觀察到用重大公共建設來刺激景氣的問題，並將之從學術的角度研究發表。而後進到國際貨幣基金 (IMF) 的研究部門，接觸到開發中國家的總體經濟議題，開啟了我研究的另一個領域。在 IMF 四年，我非常幸運能與來自世界各地一流的人才與團隊工作，並建立許多可貴的友誼。期間我和團隊所建立的 DSGE 模型，在 IMF 也成為能源豐富之開發中國家，做財政政策規劃所使用的工具之一。

在臺灣，經濟的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向來沒有太多的對話。而我在研究議題的尋找，多是從對政策的觀察或為解決實際政策分析所遇到的問題做出發，因此我深深感覺到，嚴謹的政策研究仍能在國際經濟學界得到重視。回首自大學畢業出國到現在二十多年，一路摸索走來，雖然歷經波折，但是過程峰迴路轉，讓我覺得不虛此行。更體會到唯有靠自己努力和堅定的信念，旁人的協助和機會才會出現；自助而後人助，共勉之。